



『时代学术坊』丛书

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

吴怀东◎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学术坊”丛书

安徽大学“三曹与亳州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专刊之一

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

SAN CAO YU WEIJIN WENXUE YANJIU

吴怀东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 / 吴怀东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96-3550-7

I.①三… II.①吴… III.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IV.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8700 号

出 版 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刘 姍姍

装帧设计: 许含章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0551)5146875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先后出现了军阀割据、南北分治,这对于崇尚“大一统”的民族心理而言,很长时间都觉得是一个很黑暗、很不光彩的阶段,而就在这一时期,在皇权疲弱、门阀专制、军阀割据的社会背景下,思想领域也失去了“一统”,儒家经学失去垄断地位,魏晋玄学勃兴,南北朝佛教流行,后代学者站在儒家的立场自然否定玄学,否定门阀政治,对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的评价自然也是否定的。对于研究对象性质的认定严重影响着研究者的立场,前述价值判断决定着魏晋南北朝史不是古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尽管个别领域讨论得很热闹,比如,三国史研究,大部分的讨论并非严格意义的三国史学术研究,只能算是围绕小说《三国演义》而展开的文学讨论以及道德讨论。

尽管从南朝开始,学者们侧重于从风格内涵角度把握建安文学的成就,提出了“建安风骨”、“建安风力”等概念,认为建安文学情感充沛、激情洋溢、形式华美;初唐学者批判六朝绮靡文风,提出了“汉魏风骨”的概念,认为建安以及正始诗人继承儒家诗教精神,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对建安以来伴随着文学的自觉而出现的对艺术美的追求,否定声音不绝,李白就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唐、宋诗歌出现之后,建安文学被关注的程度就更加降低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此前的先秦两汉相比,后者在思想史上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深远;与之后的唐、宋文学相比,前者文学成就不高,资料也不多,所以,魏晋南北

朝文学研究在古代就不是热门。

上个世纪初以来,由于西学的大举引进、价值观念的转变,主流学者开始重新评价魏晋南北朝。章太炎倡导“五朝学”(《五朝学》),关注魏晋南北朝思想解放的意义,标志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新局面的开始。周一良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说过:“追溯这段历史的研究,自从《三国志》、《晋书》和八书二史成书之后,头一个整理研究这四百年历史的,当推北宋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清代学者在这一段的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而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上,则没有在司马光之外作出什么成就。”陈寅恪“1931年开始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课,而这段历史的研究,似乎也从此在史学界逐渐兴旺起来”(《纪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以陈寅恪以及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等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杰出的学者先后进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使得这段历史研究成为在今天看来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中最有成就的领域。与此同时,就文学研究来说,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学者建立了新的评价体系,认为以三曹为中心的建安文学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自觉,并且出现了刘师培、鲁迅、黄侃等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进行正面的评价和客观解释性研究,而朱自清、余冠英、王瑶以及陈贻焮、曹道衡、沈玉成等先生都是沿着这个路径一路走来;研究的范围也突破了古代仅仅局限于陶渊明的研究格局,逐渐从建安拓展到三国、两晋再到南朝、北朝。

上述前辈学者基本的研究路径是打通文史,这里所说“史”除了一般的政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还包括文化史,即文学史、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等;能够综合使用各种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考古发现;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对丰富、复杂的历史事件、人物活动以及文化现象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或者一般的解释,而是将历史的过程还原出来,除了注意历史的必然性,还关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性及其造成的偶然性;研究方法兼顾微观与宏观,往往从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一个看似平常的现象入手,去观察整个社

会的变迁与走势,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间内,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价值判断代替了客观的解释性研究,文学研究界在打通文史这方面做得不够。所幸的是,“文革”结束后,逐渐恢复、继承了文史结合的学术传统,取得的成果更为丰硕。例如,周一良先生的《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原来是一长篇论文的一个部分,1981年发表时被编辑删除,后来也还是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发表的,虽是一条常见材料、一个普通的札记形式,但是,作者从史书记载刘义庆“不复跨马”这样一个细节,却发现在南朝“骑马一事在某种程度上竟成政治野心之表现”,这涉及的不是刘义庆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重大历史现象!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着眼的是整个东晋政局演变,但是,他只是利用有限的史料,分析的是历史的细节,把握的却是历史发展的走向。

总而言之,从研究对象的性质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军阀割据、南北分治,却造就了民族的大融合;儒家思想失去统治地位,玄学、道教、佛教的流行恰恰促成了中国古代难得的思想解放,这两个方面恰恰为大唐盛世的出现作了铺垫,魏晋风度的怪异、六朝绮靡的新奇无疑是吸引人的。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前辈学者所开辟的沟通文史的研究方法,要求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史学的研究不像后代文学研究那样与其他领域泾渭分明,自然难度很大,但是,引人入胜的想象力也正是在这里。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本人在至今近三十年的大学学习、教学、研究工作中,逐渐在前辈学者的影响或指导下,将三曹、建安文学暨魏晋文学的研究作为个人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1987年,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前夕,我考虑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因为阅读了余冠英先生编著的《三曹诗选》、《魏晋南北朝诗选》、《乐府诗选》,并且基于乡情观念,就对三曹及建安文学情有独钟。因为三曹籍贯谯郡,就是今天安徽的亳州市,曹氏父子算是今天安徽人的同乡,当时我对这几位安徽同乡非常崇敬,向往他们那种敢作敢为的英雄主义,共鸣于那个时期直面生死的深情,因此,最后我的

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建安诗歌抒情性浅论”。论文完成后,张先觉老师给了我“优秀”的定评,这给我产生了很大的激励,我甚至贸然斗胆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魏晋南北朝的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写信,求教如何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这是我对三曹及建安文学发生兴趣的最早经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钱志熙老师刚刚博士毕业,他结合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开设了一门课,就叫“魏晋诗歌原论”。钱老师非常注重理论的归纳和描述,不再是单纯地就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而是结合学术史、思想史背景阐释魏晋诗歌演变,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就想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改变传统的研究格局,试图从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建安及魏晋文学,后来我课程作业的论文就是《诗与歌的分野——试论中国古代文人诗的发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读书范围逐渐也由三曹扩展到整个魏晋文学,后来孙静老师指导我完成的学位论文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晋、宋之变对于刘宋诗风演变的影响》,讨论对象虽然已经越出魏晋,其实是魏晋文学的延伸,从陶渊明到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以魏晋文学为背景讨论刘宋诗歌的发展和演变;讨论在门阀政治演变、高门士族盛衰的背景下诗风的递嬗。答辩时陈贻焮先生担任主席,孙静老师和程郁缀老师为委员,沈玉成先生作为外校评审专家撰写了论文评议书,老师们给了我的论文“优秀”的终评成绩。记得那天近中午答辩结束我从五院走出来,在门口遇见周先慎老师,他笑着说“论文写得不错”。这些都给了我更大的激励。九十年代后期,读博士以及博士毕业之后,除了关注杜甫、研究唐代文学之外,三曹及魏晋文学仍然是我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为此还申请了两个厅级科研项目,甚至在韩国工作的两年期间也没有停止琢磨魏晋文学问题——那时最关注的是魏晋文学时代“最后一位”诗人陶渊明,这期间时断时续也撰写了一些文章。上述学习、研究过程就是这本论文集所收诸篇论文的来历。二十多年的兴趣,并且有幸得到中古文学研究大家的指教,留下来的竟然就是本书这点肤浅的文字,回首之际,既感且愧!

回顾上述学术背景以及本人学习的过程,当然并非只是为了抒发感慨,主要是为了说明我学术选择的原因与研究思路确立的根据。具体来说,这近二十篇论文大都属于魏晋文学,从研究对象来说还是集中在几个点上,分别是三曹父子及其家族、建安文学、陶渊明、晋宋诗歌演变,尽管有如此的差异,但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角度却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不是描述,而是侧重于解释;不是就诗歌谈诗歌,而是试图挖掘、分析、阐释某些影响文学活动却被前人忽略的综合文化背景因素。例如,《经学盛衰与曹操诗歌革新》一文较早从经学背景分析曹操文学活动的思想资源;《论曹植与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确立》则从人格生成与创作范式的角度分析曹植被中古诗人推崇的根源;《诗与歌的分野——试论中国古代文人诗的发生》则钩稽有限的史料关注、描述汉末建安时期文人中歌唱的退缩以及伴随纸笔的普及而导致的书面写作的兴起这一重大的文化史变革;《建安诗歌形态论》和《建安乐制及拟乐府诗形态考述》则讨论诗歌形态的变化对诗歌内容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古代诗史演进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就研究的具体命题的选择而言,倒不是研究之前有什么周密规划,但是,就方法而言确是自觉且一贯的。最近我读到台湾学者龚鹏程教授的大著《中国文学史(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其所论两汉魏晋文学不少观点和本人不谋而合,这对本人自然是很大的鼓励。本书所收录的论文当初发表后,确实引起过学界的不少关注,多篇被重要杂志全文转载或作为重要论点介绍。另外,就笔者所见,本书所收论文的有些观点被别人“借去”深入阐发写成宏论,虽然对本文只字不提——作为研究者,这些当然也值得我高兴,说明我的劳动还是推进了本领域的研究,还具有一定学术积累的意义。不过,今天重新阅读这些文章,本人现在发现更多的还是已有研究以及发表论文中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资料的利用还不全,观点阐述得尚不够周密,有些现象或问题虽然被提出来但缺少准确描述,另外,从根本上说,我力图继承前辈学者沟通文史的研究思路,但由于个人学力有限,做起来谈何容易,所达到的和所追求的目标距离实在还太远!所以,这

次集中成书出版,主要还是倾听读者的批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想读者的批评就是对三曹及建安、魏晋文学研究的推进,我自然十分乐意倾听!《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是另外一部专题著作中的一章,该著作至今尚未出版,因为其所讨论的就是本书的中心命题,故本书将其收入;另外,有关曹操的一篇讲稿,一篇有关陶渊明研究的书评,关于颜延之、鲍照的两篇论文,都是与“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这个题目有或多或少的关联,一并收入,特此说明。上述论文大部分发表在内地,也有的发表在中国港台地区和韩国,我十分感激当初发表拙文的那些刊物以及编辑,为此,本书将初次发表的时间和刊物名称附在各篇文章之后。由于本书所收论文研究对象相对集中,所以,材料难免有些重复使用,观点也互有照应,特此说明。

安徽大学是省属“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服务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服务地方,也为了集中力量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成绩,安徽大学中文系近年选择三曹及建安文学作为本系科研的重点领域之一,并且和亳州市政府共建了“三曹与亳州文化研究中心”,本书的出版就是这个研究定位和学术思路的实施,并且作为研究中心“三曹与亳州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专刊之一。

本书的出版得到安徽大学分管文科科研的副校长吴春梅教授的关心,得到学校文科处、人事处有关领导的支持,得到安徽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科研基金和安徽大学学术创新团队基金的资助,也得到安徽文艺出版社唐伽社长、朱寒冬总编以及责任编辑刘姗姗女士的帮助,特此说明并深致谢意!在《曹、孙集团在江淮地区的战争与建安战争文学》一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请李良同学帮助查找资料,当初还联名发表;本书所收诸论文在编辑过程中,承程晨、杨泽霞、何生同学帮助录入,麻烦王勇、焦群、金鑫同学于盛夏酷暑中校对,马玉同学也帮助做了不少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吴怀东

2009年8月23日初稿

2010年7月18日再改

目 录

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1

曹操的魅力/33

经学盛衰与曹操诗歌革新/71

文化之演进与诗学之自觉/79

——曹丕“诗赋欲丽”说抉微

论曹植与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确立/89

曹、孙集团在江淮地区的战争与建安战争文学/102

论建安文学新变与发生的地域文化背景/113

建安诗歌形态论/126

建安乐制及拟乐府诗形态考述/134

诗与歌的分野/140

——试论中国古代文人诗的发生

支遁与晋末玄言、山水诗之变/153

心灵的挣扎与生命的超越/165

——论陶渊明的人生问题及其田园咏怀诗创作

审美超越与艺术创新/184

——陶渊明田园诗与时代主潮关系论略

论儒、道互动与陶渊明思想矛盾及发展/201

论陶渊明隐逸思想之继承与创新/220

陶、杜异同及其诗史意义/232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247

——简评陈美利《陶渊明探索》

论晋宋之际的政治转型与文学革新/254

颜延之诗歌与一段被忽略的诗潮/270

民歌升降与刘宋后期诗风/280

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

小引 建安文学的历史地位与曹氏父子的重大贡献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共二十五年(196—220)。这是一个衰弱、猥琐皇帝的年号,自然也是一个兵荒马乱、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然而,人心思治,收拾残局、重建社会的稳定必然是这个时代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在破坏与重建的纠葛中诞生了杰出的英雄,而英雄必将顺应并推动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开创新的时代。

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所指称的却是一个光彩夺目、影响深远的发展阶段:

第一,“建安风骨”的确立。早在南朝,学者们就已肯定、赞美建安文学那种独特的时代风格,沈约肯定说:“至于建安……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赞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钟嵘则将“建安风力”(《诗品·总论》)作为他诗歌美的理想标准。初唐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认为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以六朝绮丽反衬“汉魏风骨”之可贵;盛唐诗人李白则称颂“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由此可见,建安诗歌乃至建安文学的“风骨”精神,成为后代诗论家批评形式主义文风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二,“文学自觉”的开始。鲁迅就认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换言之,中国古代自觉的文学创作、文学创造都从建安时期起步。因为出现了“文学的自觉”,文学创造才被视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从而自觉地追求、研讨艺术美,才能实现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现代学者提出的这个评价比古代学者的认识,似乎更能把握建安文学的历史贡献。

第三,歌消诗兴的转型。此前都是歌唱抒情,从汉末建安开始,尽管文人仍然歌唱,歌唱却越来越变为一种专门的技艺,但是,书面写作以抒情的新风兴起。歌唱之风的消退和个体书面写作之风的兴起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意义深远的重大转变,这个形态的变化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表层的是物质层面,就是书写手段的简化,如果没有汉末以来纸、笔的普及,那仍然只能是随口吟唱;深层的则是精神层面,就是文人个体意识的自觉和内敛人格的形成,如果没有生命的苦闷,哪有“独对青灯”的“长歌当哭”?

正是这个既追求个体自由也承担社会责任的士人群体及其后继者,创造了“建安风骨”,促进了“文学的自觉”,从而拉开了此后数千年中国古代文学光彩的帷幕。

出生于谯(今安徽省亳州市)的曹操及其子孙,和当时众多的英雄、才士一道,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积极进取,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转型:如果没有曹操的努力,汉末的社会动乱将持续更长时间,人民将遭受更多的痛苦;如果曹操及其大军没有意外地遭遇赤壁之战的失败,必然不会出现三国鼎立、分割分治的局面,也可能不会出现此后数百年的社会分裂;同样,如果没有曹操及其子孙的开创,也不会出现建安文学的繁荣,魏晋文化或中古文化也将会呈现



为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本文将在准确把握建安文学成就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曹氏家族在建安文学生成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及其丰富的文学、文化内涵,并进一步探讨其形成的综合社会文化基础。

第一节 乱世出英雄

“乱世出英雄”,在汉末这个空前动荡的时代,群雄争霸,时势造英雄,英雄创伟业,因此汉末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当时很多人都关注英雄,讨论英雄:曹操同时代的刘劭,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人物志》,专门讨论怎样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怎样识别英雄。刘劭对“英雄”的定义是“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者以谋略见长,“雄”者以勇武命世,“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他说秦汉之际就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但很多人是偏才,张良是“英”,韩信是“雄”,而刘邦、项羽既“英”且“雄”,属于真正的“英雄”。王粲撰写了一本书,名叫《英雄记》,他认为董卓、袁绍、刘备、曹操等都是“英雄”。事实上,后代人往往以人才众多、英雄云集评价那个时代,清初人毛宗岗说:“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材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读〈三国志〉法》)小说《三国演义》之所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就因为表现的是汉末三国时期英雄云集斗智斗勇的故事。

认识这段历史,认识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却不能依据“尊刘反曹”的《三国演义》,比如,小说刻画的曹操形象甚至与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完全相反。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争斗中,英雄豪杰辈出,董卓、袁绍、刘备、孙权、司马懿等都是当时顶尖级的英雄,然而,和曹操相比,他们无疑都相形见绌,这是时人已有的共同评价。当时



以知人著称的名士许劭,说曹操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还是一个预测性的评论,因为当时曹操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还没有将他的英雄素质展示出来;当曹操进入政坛,东汉后期大名士李膺之子李瓚就说:“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后汉书·李膺传》)曹操也自诩为“英雄”,他曾经告诉刘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曹操身材不高却极富英雄气质,《世说新语·容止篇》就记载: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崔琰,为曹操谋士)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曹操一生征战争霸,尽显其英雄本色。曹操的祖父为宦官曹腾,父亲曹嵩乃曹腾养子。曹腾很有权势,但是汉末的宦官名声非常糟糕,这样的家庭出身显然不利于曹操的发展。曹操初入官场,就通过一系列的举动刻意改变自身的社会评价:他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维持首都治安,因为宦官蹇硕叔父为非作歹,曹操毫不犹豫地将其棒杀,而蹇硕正是皇帝最为宠爱的宦官;担任议郎,他亲自上书要求为遭受党锢之祸的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平反昭雪,上书指斥三公贪赃枉法;担任济南相,奏免贪官污吏,禁断淫祀。这几件事为曹操树立了正直的形象,赢得广大士人和社会主流的认可,足以显示其才干和胆量。后来,在平定董卓之乱的过程中,曹操建立起人才队伍和战争实力,逐步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采取“奉天子以令不臣”的高明策略,“唯才是举”,选贤任能,倡导屯田,“规大河以南以待其变”,最后,在官渡之战中击败占据河北的袁绍及其军事集团,统一中原。赤壁之战败,曹操统一中国的大业功败垂成,固然有其轻敌的主观因素,但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瘟疫流行无疑也是重要的客观因素。曹操并未自立为帝,他说过:“若天命在我,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直到他死后,他的儿子曹丕才胁迫汉献帝禅位,曹氏家族从此取代刘氏成为高贵的皇族,名正言顺地建立了魏朝。



在汉末动荡的背景下，曹操乘乱而起，因时而变，他既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又有克敌制胜的军事谋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谋划生前、身后，从卑贱宦官的后代最终成长为一代高贵的帝王，创造了一个盖世英雄的神话，缔造了一个家族的传奇，并开创出历史与文化的新纪元。

第二节 多才多艺引领风骚

刘氏家天下崩溃，形成割据的局面，也打破儒家经学定于一尊的思想格局，带来思想的大解放。曹操顺应这个潮流，并推波助澜，凭借其政治、军事上的强势地位，推动着文化的革新和世风的转变。

曹操能够成为盖世的英雄，尽管有其天才的因素，更来自勤奋学习，善于借鉴前人的经验。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一位勤勉而优秀的学者，可以说后者是前者成立的条件。曹丕《典论·自叙》就记载：“（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按，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耳。”据统计，曹操既有诗歌作品，还有大量的表、奏、令、教、策、书等文字传世，当然最多的还是兵书，《隋书·经籍志》载录《魏武帝集》有二十六卷之多，如此丰富的著述在当时是罕有其匹的。明代学者胡应麟说：“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诗薮·杂编》）可见曹操著述相当丰富，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袁绍、孙权、刘备等都无别集传世。曹操在著述上和袁绍、刘备、孙权等人明显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正是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差异，最终造成了他们人生道路与终极命运的巨大反差。



曹丕介绍其在曹操的培养下读书、学习、成长的经历：“时余年五岁，上（指曹操）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典论·自叙》）曹丕读书广泛、驳杂，其实也反映了曹操读书兴趣的变化，其知识范围已越出儒家经学。曹操强调尚仁重德，却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士；多次强调“治定之化，以礼为首”，又反复强调“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三国志·魏书·高柔传》）、“礼不可以治兵”（《孙子·谋攻篇》曹操注）。所以，《三国志》作者陈寿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三国志·魏书·高武帝纪》），西晋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傅玄传》），刘勰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

纵览曹操一生的活动及其传世的文字，可见他不仅在思想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复杂性，在性格层面更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在兴趣爱好方面也与汉代上层社会形成明显的差异——他非常爱好文艺。曹操是一位多才多艺之人，而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多才多艺对社会的影响自然十分巨大。

曹操精通书法艺术，西晋张华说：“桓谭、蔡邕善音乐……太祖皆与埒能。”（《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博物志》）他还深爱音乐，特别是民间俗乐，曹植《武帝诔》追念父亲说：“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曹瞞传》说：“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恒以日达夕。”曹操生前甚至立下遗嘱，在他死后，让他的婢妾和伎人都住在铜雀台上，初一、十五从早晨到中午“辄向帐中作伎乐”（《遗令》）。曹操还精通围棋，深谙酿酒技术和烹调技艺，懂得养生技巧以及建筑设计。因此，清代学者吴淇就说：“多才多艺之士，于三国时仅得两人，一曰蜀武侯（诸葛亮），一曰魏武帝（曹操）。 ”（《六朝选诗定论》卷五）

南朝诗论家钟嵘说：“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